

内部材料 注意保存

# 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辅导材料

一九八一年七月

# 伟大的历史转折

王 洪 模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它“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我们学习《决议》，联系党的整个历史，研究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作用，也可以把它称为我党成立六十年来继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之后的又一次伟大转折。当前我们在学习《决议》中，认真研究三中全会召开的历史条件和所解决的问题，加深认识它在历史上所起的伟大作用，对于自觉沿着三中全会所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是很有意义的。

## 一、三中全会召开的历史条件

探讨三中全会召开的历史条件，首先要研究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有了一九七六年十月的胜利，还要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新的战略决策？而且不这样作不行。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重温列宁在《论国家》中的一段教导。列宁说：“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被一大堆细节或各种争执意见所迷惑，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列宁选集》第4卷第43页）三中全会同以前党的工作的基本历史联系是什么？这就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党中央政治局执行人民的意志粉碎了“四人帮”，在危难中挽救了党和革命事业，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可是，当时由

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问题的复杂性，粉碎“四人帮”主要是解决了敌我问题，未能明确指出并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长期严重左倾错误，这种情况由于后来的主客观原因被延续下来，造成头两年党的工作徘徊前进的局面。我们学习《决议》，分析三中全会召开的背景，要研究一下所谓徘徊前进的内容是什么？造成徘徊的原因是什么？

所谓前两年党的工作的前进，是说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几方面工作，取得了成绩。

第一、党领导人民开展了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清查了他们的帮派体系，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很大一部分权力，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出现全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第二、在恢复被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主要是随着国内乱的终止，安定团结局面的出现，党在领导揭批“四人帮”的同时抓了经济恢复工作，因而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

第三、科学教育和文化工作也开始恢复正常，初步改变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科教文工作被搞乱了的局面。

第四、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也开始部分地进行了。

第五、从一九七八年五月起，在报刊上、理论界，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使人们受到了唯物主义的思想教育。

以上这些，都为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和三中全会的召开，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从这些方面看，新时期头两年的工作，较之“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很明显是前进了。所谓前进，主要是指这些方面。

但是，这两年也暴露了许多严重问题，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经

济上都表现出来了。集中起来说，就是党在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全面性、长期的严重左倾错误方面徘徊不前，还出现了较多的新失误，没有取得本来应当取得的更多的成就。当着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开始深入下去的时

候，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四人帮”赖以活动的条件之一是“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和方针。因此，党内外同志越来越热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左倾错误，可是这种正当要求却遇到了严重的阻碍。这在客观上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时期消除，同时也由于在主观上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指导思想方面继续犯了左的错误。华国锋同志在执行中央政治局决定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可是，如《决议》所说，华国锋同志从七六年十月以来在许多方面继续推行“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和方针。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一九七七年八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同志的错误的影晌，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

上述几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延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方针，阻碍人们拨乱反正的言行，挫伤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出现的那种革命热情和积极性，延缓了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事实证明，由华国锋同志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对于两年徘徊的客观原因和主观指导原因的关系怎样看？历史的分析，粉碎“四人帮”后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短时期内认识不清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党的主席华国锋同志长期如此，特别在党内外广大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及其危害已有认识，并强烈要求纠正的情况下，自己不但跟不上全党的步伐，反而成了“阻力、挡头”，这就不简单是认识

问题，就是不能原谅的了。当时我们党面临着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一个严峻的考验，就是对毛泽东同志一生中的丰功伟绩必须充分肯定，对他长时期坚持并实施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针一定要发扬光大；但同时毛泽东同志晚年即“文化大革命”中的失误，一定要提出纠正。这样才是有马克思主义的清醒头脑和原则态度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把党的事业引向前进。正象《决议》所说，我们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能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同样，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华国锋同志正是在新的实践中，在很多方面企图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方针和口号。因此，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原则分歧，是不能迁就和调和的。

这样，三中全会前夕，历史的现实向党提出结束两年徘徊，并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清除其影响的要求。问题是这样尖锐地摆着：如果不纠正这种左倾错误，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很好地前进，而只能在徘徊中继续遭受损失；如不彻底纠正左倾错误，在一定背景下也可能重复类似“文化大革命”那种局面，那是很危险。华国锋同志不是说“文化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吗？按照华国锋同志的指导思想，重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不是不可能的。所以，客观形势要求党必须召开一次象三中全会这样的会议，来解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胜利和其后的两年徘徊所未能解决的重大问题。必须依靠中央集体的力量，实际着手纠正华国锋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期的错误。当时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对国锋同志还是帮助他、推动他，并没有提出调整职务的问题。（党内同志强烈要求调整国锋同志的职务，是在三中全会后的两年中，在华国锋同志对自己错误毫无根本转变的情况下，才提出来的）

其次，三中全会的召开，还有更为深远的历史背景。那就是当时的形势，不仅是“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左倾错误有待于纠正，还因为一九五七年以来二十多年积累的问题也需要解决。特别是建国以来党内逐渐形成的左倾错误思想还未及清理，这种左倾错误思想曾是“文化大革命”能够发生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这样，客观形势也要求我们党召开一次中央全会来解决这些问题，以便全党上下同心同德搞“四化”。所以，三中全会又是以最近二十多年的历史为背景的。

## 二、三中全会召开的简要情况

三中全会召开前，先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时三十六天。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才正式开三中全会，十二月二十二日结束，共开了五天。三中全会以后又开了一天政治局会议。三个会议加在一起近一个半月，是粉碎“四人帮”以来开得最长的会议，也是解决问题最多的会议。研究三中全会的精神，要把三次会议结合起来去领会，三中全会公报就包括了中央工作会议的内容。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始，首先由华国锋同志致开幕词，代表中央常委提出来要把我们工作的着重点转到四个现代化上来。关于工作重点转移问题，最早是七八年九月邓小平同志在东北视察时提出来的。他提出全党工作重点要准备转移到“四化”建设上来。他的建议得到政治局常委的赞同，在三中全会上作为政治局常委的集体意见提出来。中央常委的这个提议是正确的。所以华国锋同志讲话以后，许多同志热烈拥护工作重点转移的提议，但也有些同志提出，与此相应还要解决一些历史上的大是大非问题，实质上是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陈云同志在东北组发言时说，为了搞好工作重心的转移，应当解决“文化大革命”和历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讲到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天安门事件”、康生的错误等六个问题，提请中央决定。陈云同志说，我很担心这些问题不解决，分不清这些问题上的重大是非，能不能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能不能同心同德搞“四化”。陈云同志发言以后，会议的空气就活跃起来。接着，

在继续讨论中又提出“一月风暴”、“二月逆流”、“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一系列问题。大家认为，邓小平同志一九七五年主持工作时搞得很好，人们说“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又回来了，根本不是什么右倾翻案风”。这样，中央常委决定，会议就这么开起来。从中央工作会议到三中全会，都是放手让大家讲话。大家总结工作，肯定成绩，批评错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畅所欲言，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是指名道姓的。根据胡耀邦同志的传达，两次会议大家都抢着讲话，绝大部分没有什么稿子，放开讲，发言自己负责，定稿就登简报。要长就长，要短就短。也有些人写了稿子，写了一本本。两个会，产生了三中全会公报、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陈云同志的八个讲话、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〇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李先念同志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等重要文件，还产生了登载五百多份发言的简报。由于简报上的发言，中央都没有核对过，不便于提供给我们研究，所以我仅就三中全会公报和华、叶、邓、陈几位领导同志的八个讲话，以及两个农业文件、一个计划文件，谈一下从党史的角度看三中全会的主要贡献及其意义。

### 三、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在前述背景下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的历史贡献是：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的徘徊，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路线，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

第一、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思想路线。

三中全会对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并作出了决定。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纠正了左的指导思想，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

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次全国性的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就把思想路线的解决，提到党和国家存亡的高度。全会把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作为党的指导方针。

以上几点表明，三中全会重新明确了实事求是是我党思想路线的基本要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这条思想路线的根本原则。对待毛泽东思想要从科学体系上去掌握和运用，不能摘引支言、片语加以割裂和歪曲，不能搞“两个凡是”，这才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态度，从而根本上恢复了党的正确思想路线。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破坏下，十多年不强调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党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优良传统遭到很大的破坏。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头两年，有些同志又把“两个凡是”作为指导方针，造成党内思想理论方面的极大混乱。所有这些都成为我们过去工作中发生失误的重要思想根源。所以，三中全会在拨乱反正方面，注意从思想路线入手，恢复党的正确传统是非常正确的。

三中全会对正确的思想路线不但有恢复，而且有发挥。它针对过去多年存在的左的思想僵化的情况，提出对那些错误的现成结论，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去辨别，有了这一点才能从实际出发对错误的东西进行拨乱反正，做出符合实际的新结论。同时也说明了解放思想不是胡想乱说，而是按照马列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去解放思想，统一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一致向前看。三中全会在思想路线上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是全会的重大功绩之一。

第二，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政治路线。

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作出了把工作



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会对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的基本内容，作了重新概括，即：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并且立即行动起来，群策群力，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

三中全会公报对于什么“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以后要进行多次等等，都不提了，而是强调在党的领导下，安定团结，同心同德搞“四化”，这与党的“十一大”遗留的许多错误提法是个鲜明的对比。这不是三中全会由于疏忽而没有写那些东西，而是有意识地否定了那些左倾理论和方针。这就不但根本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方针，而且抛弃了头两年延续的一些错误口号，恢复和发展了党的“八大”政治路线。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新时期只有坚决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才能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才能正确执行新的历史任务。一九五六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曾经科学地分析了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国内形势，指出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党和人民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但从一九五七年以来，由于某些原因，“八大”规定的战略方向和历史任务没能始终如一地贯彻下去，曾经出现过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干扰、冲击社会主义建设的现象。三中全会在粉碎“四人帮”两年后的新形势下，坚决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恢复和发展党的“八大”的正确方向，正确地概括新时期的历史任务，就完成了党的“十一大”所没能完成的拨乱反正的任务。

为什么说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呢？

第一、因为三中全会确立的政治路线，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新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基本任务的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无产阶级专政及其任务的论述中，就讲到这个问题。在《共产党宣言》里，马恩曾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

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72页）马恩的这段论述，包括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在三个不同时期的重要内容：一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这在我国一九四九年已经解决了。二是无产阶级要利用自己的政权，剥夺剥夺者。在我国，就是没收官僚资本和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已经完成了。三是“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是我国一九五六年之后已经提出，没能很好实现，而成为当前最紧迫、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重要任务。

列宁在一九一八年写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也提到：“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的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09页）列宁在这里强调剥夺剥夺者的任务基本解决以后，就要把提高劳动生产率放在党的工作的“首要地位”，并且把它作为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来看待。

上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尤其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就是组织和发展经济，繁荣和提高文化，“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的总量”的论断，构成马克思主义关于新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基本任务的重要观点。这些恰恰是过去被我们一度忽视了的观点。实践证明，这些正确观点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发展规律，是科学的真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新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基本任务的这些论断，来确定自己的政治路线的。

第二、三中全会的决策，也符合我国客观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三中全会的上述决策，是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二十多年的条件下作出的。这时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和资本家阶级，早

已经不存在了。广大人民同剥削阶级残余分子的斗争，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形态。

我们国内现在还存在着极少数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存在着林彪、“四人帮”的残余势力，存在着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分子和其他旧剥削阶级的某些残余，存在着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新的剥削分子，同时国际阶级斗争又同国内阶级斗争密切联系着，因此，我们决不能放松同剥削阶级残余势力的阶级斗争，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整个说来，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目前的主要矛盾。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把我国目前很低的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到现代化水平，为此而改革我国目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那些妨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部分，扫除一切不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旧习惯势力，这就是我国现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显然，三中全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确定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斗争和实行工作重点转移，正是为解决这个主要矛盾而采取的政治路线。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这里举几个材料：一九四八年有个材料曾估计我国有三千六百万地主富农分子，三十年来地富分子死了不少。现在还存在的地富分子（指摘帽以前）约有四百万。经过评议，绝大多数地富分子已经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表现不好抗拒改造因而继续戴帽的不到五万人。这五万人分散在具有八亿人口的农村。有的县，群众评议后继续戴帽的分子是原来地富分子的千分之一。民族资本家在一九五六年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时候，全国工商业者是七十一万，加上私方代理人五万，一共七十六万人。二十多年死了一部分，退休了一部分，当时把有些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小业主也划了进去，现在落实政策又划了出来。结果，现在全国企业、商店里担任工作的原资本家约有十多万。那么这些人担任工作的情况怎样？据上海、无锡、天津部分企业的调查：在这部分企业里一共有原资本家六千一百三十五人，其中有二百九十八人退休，剩余参加车间、商店等基层劳动的

原资本家有五千三百七十七人，工程技术人员有十九人，一般科室管理人员有四百三十四人，担任车间主任的七人，担任厂长、经理的没有。这个状况是全国的一个缩影。他们的工资状况如何？根据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四个城市的统计：现有的原资本家，工资在五十元以下的占百分之二十一点三，工资在五十元至一百元的占百分之五十八，两项加起来占百分之七十九点三；工资在一百元至二百元的占百分之十七点七，二百元至三百元的占百分之二点三，三百元以上的占百分之零点七。这个工资收入和我们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收入差不多。从这里得出简单的结论，原资本家在企业被改造以后，人的改造经过二十多年参加实际劳动，绝大多数已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是我党的正确政策的胜利。这种阶级关系的现状，正是三中全会关于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依据。实际上这种类似的阶级关系变化状况早已出现了，由于过去工作的失误才推迟了工作重点的转移，干扰了正确政治路线的贯彻。

总起来说，三中全会使党的政治路线从根本上转到了马克思主义轨道。所谓根本上，就在于它坚决摒弃了“左”倾理论和方针，根据早已出现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的变化，适应新的形势，毫不动摇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规定了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的目标和工作重点的转移，大大发展了建国以来我党根据实际情况所采取的正确政治路线。当然，党在新时期政治路线的完善，是要经过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和一系列新的实践中才逐步完成的。可是，从三中全会开始重新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决定的工作重点转移，不是简单的事。要使全党全国人民从多年来习惯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转到今后主要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讲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正确处理只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这种主攻方向转变，不仅是重要的政治转变，也是人们头脑中的重要思想转变。现在我们党正在从两方面清理“文化大革命”留下的严重后果，一是公开审判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十名主犯，二是通过了《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两件事情的完成，使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正确政治路线更加深入人心，进一步统一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

第三、三中全会提出了全党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这表明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和农业政策方面开始纠正左的错误，确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

三中全会规定的政治路线，其基本内容是安定团结、同心同德搞“四化”，为了落实这个任务，就要扎扎实实地把经济工作搞上去。因而，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讨论一九七九、一九八〇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和尽快把农业搞上去的问题。

全会认为，制订经济计划应坚持既有雄心壮志又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原则，不能单凭良好的愿望，急于求成。与会者说，提到会议的工业方面的两年规划，方向是对头的雄心壮志是好的。但是，国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没有揭露出来，实际存在的问题不解决，生产是搞不上去的。有些什么问题没有解决呢？主要是国民经济中的重大比例失调没有揭露出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一些混乱现象没有完全消除，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妥善解决，还没有切实做到综合平衡。再是经济管理体制上的严重缺点也没有找出来。会议讨论的意见可以概括成这么几条：第一是工业同农业的比例关系失调。第二是基本建设同工业生产、基本建设同发挥现有工业生产潜力这个比例关系也失调。第三是先行工业没有能够真正先行。工业上的粮食，如煤、电、石油、原料等，不够吃；交通运输一直紧张。第四是经济管理体制上存在着弊病。诸如权力过于集中；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以党代政，以政代企；机构庞大，责任不明等等。

三中全会的功绩之一是及时发现了这一情况，提出必须立即解决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失调问题，同时要改革国民经济管理体制，克服上述弊端，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各部门各环节普遍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全会原则同意提到会议的两年来经济计划安排，但因为其中有些问题还没有解决好，所以建议国务院在修改后再提交七九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

论通过。正是在三中全会这一精神指引下，七九年四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指引我国国民经济逐渐走向比例协调发展的正确途径。

为了尽快地把农业搞上去，三中全会经过深入讨论，制订了两个农业文件。三中全会关于农业文件的基本精神是，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些年来又受到严重破坏。农业搞不上去，粮食不够吃，林牧副渔等得不到很好发展，半个现代化也实现不了。三中全会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我国过去农业的发展情况，指出了取得的成绩，同时承认近二十年来我国农业的发展速度不快，出现过两个马鞍形：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是一个马鞍形，“文化大革命”十年又是一个马鞍形。要讲真话，不是什么十三年连续大丰收。只有实事求是地揭露存在的问题，才能对症下药，想方设法把农业搞上去。会议提出把农业搞上去的二十五条措施，主要体现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文件强调头几年关键是纠正农业方面“左”倾错误政策，全面落实党的正确农业政策，把国家、集体、个人这三个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在经济上必须充分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政治上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制订了一系列当前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政治措施和经济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实行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组，联产计酬责任制；实行粮食和经济作物并举，农、林、牧、付、渔、五业并举；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人民公社要坚定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要坚决实行民主管理、干部选举、帐目公开。会议认为，只有全面落实党的农业政策，把农村经济繁荣起来，才谈得上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

会议制订的农业上的两个文件，打中了农村工作的要害，两个文件的贯彻，使农村普遍出现了繁荣景象。这就说明了农业文件的正确性。

第四，三中全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这就在消除阶级斗争扩大化后果、健全人民民主和法制制度方面，做出了正确决定。它既有利于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搞“四化”，又使我们有健全的法制制度去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维护人民的民主利益，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第五、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就着手解决组织方面的问题。在大部分地区基本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把他们篡夺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很大一部分权力重新夺回来，就是一次重要的解决。但是组织上还存在着“四人帮”横行时期和左倾错误统治时期遗留的很多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因此，党的组织原则的恢复和重要干部职务的调整是势在必行的，也是与会者和广大党员的强烈要求。

三中全会适应这种形势，决定在组织上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反对制造和接受对个人的崇拜，加强集体领导。同时全会增选坚持党的正确原则的同志加强党的领导机关和建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议增选陈云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三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会考虑到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的生活的实际变化和目前党的工作的迫切需要，决定采取临时措施，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九同志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这是解放以来所没有的措施。过去，七大以前有过，有采取这种措施的先例。全会选举陈云同志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同志为第二书记，胡耀邦同志为第三书记，黄克诚同志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同志为副书记，还选举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和委员。

三中全会结束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是解决组织问题的继续。政治局会议除了讨论决定新增加同志的分工，还讨论了一系列的人事安排。第一，中央设立秘书长、副秘书长。确定胡耀邦同志担任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辞去中央组织部长职务。确定胡乔木同志担任中央副秘书长兼毛著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汪东兴同志不再兼毛著编委会的职务了。确定中央第二位副秘书长是姚依林同志，他还兼任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也就不再兼任办公厅主任了。确定宋任穷同志为中央组织部长；张平化同志调到中央党校当副校长，后又调任农委副主任；建议调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同志当国务院副总理兼农委主任。会议还确定冯文彬同志兼任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杨德中同志（原在周总理身边，是八三四一部队政委，后被“四人帮”排挤走了）调回中央办公厅任警卫局长兼中央警卫师师长、党委书记。因为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上许多同志对中央部门的人事安排，提出了很多意见，政治局接受同志们的意见，才重新做了这些安排。汪东兴同志原来身兼许多职务：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办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毛泽东著作办公室主任、“毛办”党委书记、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中央专案组组长等职。一个人集中了这么多重要权力是很不合适的。这次把许多兼职减下来了。三中全会对汪东兴等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粉碎“四人帮”后又犯新的严重错误的同志，主要不是算多少年前的老帐，而是着眼于现在，既看到他们犯的严重错误，又看到他们曾经做过的有益工作，坚持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方针。没有采取过火斗争和过分处理的做法。这表明，三中全会在党内斗争上已经恢复了我党的优良传统。

三中全会在领导工作中作出的这些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是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标志，也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为什么说它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呢？因为三中全会解决了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及其以后两年所未能解决的根本问题。前面讲到，粉碎“四人帮”有伟大历史意义，它在危难中挽救了党和革命事业，为三中全会实现



的伟大历史转折创造了重要前提。但是，必须看到，粉碎“四人帮”主要是解决了敌我问题，未能明确指出并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长期的严重左倾错误，这种情况又由于后来的主客观原因被延续下来，造成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徘徊。所以粉碎“四人帮”未能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两年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成为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三中全会作为伟大的历史转折点，其实质内容在于：它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恢复和发展了党在过去行之有效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恢复和发展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并解决了过去长时期没能解决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一句话，就是开始结束多年来左倾错误严重干扰党的工作的历史，使党的事业全面转上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同时又决定了工作重点的转移，把全党和全国人民带上向“四化”进军的新征途。这些都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既或有了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也不能巩固；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进入新时期，也会出现党的工作的徘徊局面；提出了向“四化”进军的宏伟目标，也不能保证道路正确，一往直前。反之，这些根本问题解决了就结束了七六年十月以来的两年徘徊，并最终巩固了粉碎“四人帮”的重大成果，消除了“四人帮”的帮派残余妄想利用左倾理论和方针，重新作乱的危险，稳定了新时期的正确航向。这些根本问题解决了，就使我们党在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找到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这些根本问题解决了，就使我们国家从七九年起真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三中全会纠正过去的左倾错误，把党的工作重心切实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意义非常重大。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曾提出要把经济工作放在重要地位。但在革命战争年代，经济工作不可能成为主要工作。这只有在夺取了全国政权并基本完成了改造私有制的任务以后才能实现。我党从一九五七年以后，就开始把工作重点逐渐向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方面转移，并且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工作指